

海外名家学术文库  
HAIWAI JIAMI JIAOXUE SHUWENKU

□ 丛书主编 孙昌武

萧丽华 著

# 从王维到苏轼

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

海外名家学术文库  
HAIWAI JIAMEIXUESHUWENKU

□ 丛书主编 孙昌武

萧丽华 著

# 从王维到苏轼

——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 / 萧丽华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1

(海外名家学术文库)

ISBN 978-7-5309-6950-2

I. ①从… II. ①萧…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6374号

### 海外名家学术文库

### 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

出版人	胡振泰
作    者	萧丽华
选题策划	李勃洋
责任编辑	王铁冰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a href="http://www.tjeph.com.cn">http://www.tjeph.com.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787×1092毫米)
字    数	321千字
印    张	27.75
定    价	56.00元

# 序

唐宋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诗歌艺术形式与内涵的高峰。

在佛学方面，据颜尚文所考隋唐佛教有十五宗之多，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亦列论三论、天台、法相、华严、戒律、禅、净土、真言、三阶等九宗，形成思想史上缤纷的一环；宋代更进入禅、净、华严、天台等佛教思想融合兼修的发展期，特别是禅宗以五家七宗，盛极一时，为文学注入了丰富的养分。

在诗歌方面，盛唐王、孟、李、杜的大诗家中就出现了“诗佛”，与“诗仙”“诗圣”鼎足而立；即便是李白、杜甫，也有不少关涉佛教文化与佛学思想的作品。唐代同时也是一个诗僧辈出的时代，灵一、皎然、贯修、齐己等人，一生致力于诗，为禅林文化树立起“诗僧”传统，更为诗歌创作方法补充不少理论，如皎然的《诗式》、齐己的《风骚旨格》等，中唐以来的诗僧，已经在诗坛留下许多理论与创作。宋代更是进入禅林文士化、文士禅林化的世代，文人习禅与僧人作诗，都是空前兴盛；以苏轼、黄庭

坚为前导，经诗僧惠洪的努力与实践，宋代诗坛兴起一片“诗为文字禅”“学诗如参禅”的风气。诗歌与禅学，可以说是在唐代与宋代完成了真正的互补与融合。

因为中文系出身的关系，尽管我喜欢阅读佛典与佛学相关著作，却不能舍去古典诗研究的本行。二十几年下来，徘徊于古典诗与佛学之间，不知不觉竟写下几十篇关涉诗歌与佛学的作品。这本书收集这二十来年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每篇作品都有当时思考诗、禅这两大领域如何会通的关键。一方面为了能呈现诗学的典范，一方面又为了展现诗禅交会的多元样貌，于是我在王维与苏轼这两大诗家停留较久，着墨较多，二人代表着唐诗与宋诗的两种典型，同时又是诗禅交会的重要人物，其中可观察的样态自然较为丰富而多元。

《论诗禅交涉——以唐诗为考索重心》与《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唐人宴坐诗析论》两篇文章大约完成于 1996 年，主要思考唐代诗禅交涉的基础和诗禅交涉几个面向，同时透过唐人的“宴坐”，观察佛教禅坐对诗歌境界的开发。参禅者在宴坐中往往有超越时空的体验，随参禅高下而神力不同，所显出的诗境在唐诗中呈现缤纷的林下风流。《试论王维宦隐与大乘般若空性的关系》《从禅悟的角度看王维自然诗中空寂的美感经验》与《禅与存有——王维辋川诗析论》三篇文章，是我初期藉王维诗观察诗禅结合美学的作品，大约写于 1994 年～1997 年之间。首先藉“宦隐”的特殊观点，突显佛教思想的意识与世界观如何影响到诗人的价值体系，而后藉王维的自然诗，谈诗的“空寂”美学，最后

以“辋川诗”这组王维诗的代表作，作为禅宗“空寂一万有”之美学的展示，为了充分诠释出此中的美感，这篇文章中还借用海德格尔存有论作为对照，建构出一种测度诗禅融合的美学坐标。禅本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主体精神意识甚或无意识，与诗歌美学有对应思考的价值，王维无疑是最佳的体现者。

《白居易诗中庄禅合论之底蕴》一文写于1996年。从中唐时间片断与空间分布看来，此时禅已超越各宗一枝独秀，而且朝一花开五叶的法门分系发展。白居易处于德宗贞元、宪宗元和、长庆时期，正是南宗禅中期发展阶段。南宗禅的特色是完全的中国化，也就是庄禅合辙的走向。这篇文章因此从时代思想发展背景——庄禅合流与洪州禅入手，以白居易诗加以检证。《晚唐诗僧齐己的诗禅世界》一文写于1997年，处理的是诗僧的作品。诗僧是唐代诗禅合辙的文化侧影，本文以齐己为例，分析《白莲集》中的诗禅世界，同时凸显唐代诗僧在诗禅融会上的努力。

进入宋诗的研究后，苏轼成了无可回避的一大重心。《苏轼诗中的禅喻》一文写于2001年，处理了苏轼在诗禅合辙上的主张。《佛经偈颂对苏轼诗的影响》一文写于2003年，为了观察苏轼诗的特殊倾向，加上苏轼影响黄庭坚，本文也算是以苏诗证明苏黄对宋诗的影响。接着，《苏轼诗禅合一论对惠洪“文字禅”的影响》一文写于2003年，属于此一理路的观察，注意从苏轼到惠洪所发展起来的“妙观逸想”“游戏三昧”等问题。然后，我采用宗派思想观察的方式进入苏轼诗，一连写了几篇文章，先用禅宗与般若思想观察苏轼诗，《苏轼诗的般若譬喻》一文完成于2004年，

又从其用《华严经》25次、《圆觉经》18次的频率，推测东坡与华严思想必有某种程度的绾合，因此一连于2006和2007年再写了《苏轼诗的〈圆觉〉意象与思想》与《苏轼诗中的华严世界》两篇文章。果真在此中发现，一般人熟知的东坡以“人生如梦幻”此一人生主题，其思想意识的创造来源，其实是结合着般若空观与《圆觉经》的“如幻三昧”而来的，这也印证了宋代禅宗的华严走向。最后，2007年应国科会要求，在联合发表会上发表《从庄禅合流的角度看苏轼诗的舟船意象》一文，为我的东坡研究画下句点。

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贡献，堪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从王维到苏轼，诗歌的创作样态与佛教禅学思想高度结合，可以说是诗禅交会的黄金时代。从中国古典诗坛的成就上来看，实在应该感谢这些诗人与僧人，他们以毕生最精彩的生命风华，和佛教结下殊胜的因缘，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处别有洞天的广大领域，他们的作品与理念犹如深山大海中的宝矿奇珍，为中国佛教留下许多不朽诗篇，为佛教文学开出烁古耀今的奇葩。我只是个采矿者，在唐宋诗坛的宝山中开采出部分的珍宝，以提供学界一些思考。

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从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与四川大学周裕锴教授的著作中得到不少启发，谨此向前辈学者致敬。同时，感谢天津教育出版社李勃洋先生的督促与期勉，全书终能顺利结集问世。尽管书中有些唐代的篇章曾在台湾出版过，但重新编整修订，扩大时代范畴，应该能为由唐入宋的诗禅交会意义与唐宋佛教文学的思考，勾勒出重要梗概来。谨以此书与海峡两岸佛教文

学研究的同好结缘，期望各界方家能不吝指正。

完成书稿修订工作时，正值短期研究，客寓京都，日本各界正在悼念 2011 年东北地区 311 震灾罹难的亡灵，今年京都的春天迟迟不来，我留下一诗予 3 月 11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作为自己生命旅程的纪念。

### 残冬京都闲居

闲居无事闭苔苔，篱下萧疏枳壳开。  
夜半风寒天色异，晨兴雾散日光来。  
鸟飞绕舍呀呀叫，雪絮漫天点点回。  
客寓京都此时节，前尘寂灭任成埃。

萧丽华谨序于京都枳壳居

2012 年 3 月 11 日

# 目 录

论诗禅交涉——以唐诗为考索重心	1
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唐人宴坐诗析论	27
论王维宦隐与大乘般若空性的关系	65
从禅悟角度看王维自然诗空寂的美感经验	92
禅与存有——王维辋川诗析论	127
白居易诗中庄禅合论之底蕴	156
晚唐诗僧齐己的诗禅世界	182
苏轼诗的《圆觉》意象与思想	205
苏轼诗中的华严世界	222
苏轼诗中的般若譬喻	243
佛经偈颂对苏轼诗的影响	282
从庄禅合流看苏轼诗的舟船意象	322
苏轼诗论中的禅喻	344
苏轼诗禅合一论对惠洪“文字禅”的影响	375
参考书目	409

# 论诗禅交涉

## ——以唐诗为考索重心

从古印度吠陀时期的《奥义书》中可知印度是诗的民族，佛典许多文字明显有诗的形态，而中国文学历来也是以诗歌为主流。诗与禅之间在现实世界里似乎注定有许多共通的特质。佛典初译入中国的汉晋阶段，诗体与音韵都起了变化、融合与反省，这是诗与禅在中国最初期的“交涉”<sup>1</sup>，佛教三藏中丰富的诗篇在中国寻求出以“偈颂”<sup>2</sup>的面貌出现，中国诗歌的句数篇幅乃至由抒情主体过渡到叙述与说理形态的变化，也正是诗禅之间相互影响、交汇、合流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说诗禅交涉是中国文化史上除“格义”之外，在佛教文化影响下的另一大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一直潜伏不彰，直到唐宋才蔚为大观，引起广泛的注意，尤

- 
1. “交涉”一词为哲学用语，意指两大范畴之间交互的作用，本文使用这个词语的意义取于石头希迁对药山惟俨禅师示道的一则公案。见《卍新纂续藏经》第七十九册《联灯会要》卷十九，页162下一则：“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禅本非言语动用，本文强作诗禅交涉之论可见一斑。
  2. 佛典十二分教中，“祇夜”和“伽陀”都是韵文，“祇夜”又称“重颂”，是散行经文之后，以韵文重复歌颂的部分，如《法华经》《金刚经》中皆有。“伽陀”又称“讽颂”，是一种独立的韵文形式，如《维摩诘经》中的偈诗。二者在中国都被称之为“偈”或“偈颂”。偈颂在梵文原典里都是正式的诗歌，译入中国也不能不以诗歌体裁看待它。

以唐人“以禅入诗”及宋人“以禅喻诗”是禅学影响诗歌与诗学理论的两大风潮，但这毕竟是以诗为本位的观察方式，如果以禅为主体，仍可看出诗歌影响禅僧所呈显的乐道诗与偈颂诗作。

有关诗禅之间交互关涉的研究一直是较薄弱的一环，直到近年来才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目前已有不少论著谈论到诗禅之间的关系，但多为大陆学人之作<sup>1</sup>，本文之所以赘添一笔，旨在唤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注意，同时也对我自己近年来相关研究作一系统思索。

元遗山《嵩和尚序》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对中国古典诗歌不管在表现方法、理论系统与创作内容上都有极深的影响，禅对诗的发展提供了滋养、借鉴、启发的积极功能，这是不能否认的。而诗对宣讲不可言说的禅道，对僧人赞佛、护法、证乐的表达也提供了适切的语文形态，禅僧居士的乐道诗与偈颂诗增补了中国诗歌璀璨的一页，这点同样不能淹没，这都是本文希望表达的重心。

---

1. 现有的诗禅相关论述除早期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1976年版）、陈荣波：《禅与诗》（《现代佛教杂志》）及李立信：《论偈颂对我国诗歌所产生的影响》（中央大学“文学与佛学关系研讨会”论文，1991年5月26日）外，坊间出现的专书及论文多为大陆学者之作，如赖永海：《佛道诗禅》（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森：《禅宗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高雄：丽文文化，1993年版）、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伯伟：《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孙昌武：《诗与禅》（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等。

## 一、诗禅交涉的起点：从汉译佛经说起

诗禅交涉应起于佛经翻译与僧人文士往来这两大历史环境背景：汉译佛典的起始时间说法不一，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志盘《佛祖统纪》、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均载中天竺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共译的《四十二章经》，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一书断自安世高译《明度五十校计经》，然争议者仍多。比较可信且无争议的应是汉桓帝初到中土的安息国人安世高所译的三十九部佛经，及桓帝永康元年到洛阳的月支人支娄迦谶所译的十四部佛经<sup>1</sup>，可见诗禅交涉在诗与偈之间，早于东汉时代已开始了相互的融通。汉译佛经的工作是艰巨的，影响的时间也是历久绵远的，从东汉至唐宋乃至元代都有典籍译入中土。以元世祖至元廿四年最后一部经录的统计，从东汉永平十一年到当时千余年间，留存的佛典凡 1444 部，5586 卷<sup>2</sup>，数量之庞大，历时之久远，影响之深广应可推知一二。

佛典一般指经、律、论三藏典籍，大部分是佛陀弟子们追溯师教结集记录下来的佛陀教法。释迦牟尼佛说法时善用比喻、诗偈、故事等不同方式，因此佛经充满丰富的文学内容与表达效果。北传佛教称佛典为“十二分教”，就是这多元内涵的分类<sup>3</sup>。其中与诗歌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便于记忆和传诵的韵文

1. 李立信：《论偈颂对我国诗歌所产生的影响》（中央大学“文学与佛学关系研讨会”论文，1991 年 5 月 26 日），页 7、8 所考。
2. [元] 庆吉祥等编录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版）卷一，页 1。
3. 十二分教或称十二部经，即契经、应颂、授记、讽颂、无问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议。

偈颂。《法句经》一类的经典就是以韵文的“说法警句”为首，再配以散文故事的行文方式。佛典中系有大量的这种韵散并行的体裁，其韵文部分可谓是翻译诗。然而这些透过“笔受”<sup>1</sup>的翻译诗，其形式与美学范式和中国古典诗相去甚远，我们一般只称之为偈颂，未能以“诗”作看待它，但是它采用中国诗歌形式与中国诗歌交涉及其原为诗歌的本质，却是不可抹杀的<sup>2</sup>。由于初期译经，担任笔受者不一定是文人，文学修养不一定足够，偈诗或嫌质直，但后期译经时多有文士润文，如昙无忏译经时曾有谢灵运参加，玄奘译经有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人润文，义净译经有李峤、韦嗣立、卢藏用、张说等人润文等等<sup>3</sup>，诗与禅的交融在佛经翻译上确实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据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所考，东汉虽已开始佛经翻译，但东汉文人对佛典认识仍少，三国时，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尚浅，晋以前汉人信佛仍受到种种限制与谮毁，文人接受佛教的契机起于晋代玄学，玄儒老庄与般若才开始汇通往来<sup>4</sup>。西晋时竺法护译

---

1. 初期佛经翻译的译师多为西域人或印度人，不娴汉语只能口述大意，由华人写成经文，华人撰写的职务名为“笔受”。

2. 关于佛典中的“偈颂”与中国诗歌的差距，参照李立信：《论偈颂对我国诗歌所产生的影响》一文（中央大学“文学与佛学关系研讨会”论文，1991年5月26日），页2。而佛典偈颂在形式、篇幅、内容上与中国诗歌的交互影响，李文页9~24也有详细的析辨。李氏认为翻译佛经中的偈颂不但采用当时诗坛流行的诗歌形式，而且篇幅较我国诗歌为长，内容也突破只重抒情传统的形态，出现较多说理、励志、告诫、叙事的偈颂。《孔雀东南飞》是中国诗歌吸取偈颂长篇形式及叙事内容之后推陈出新的第一首长诗。

3. 参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续高僧传》第五卷，页464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宋高僧传》第一卷，页710下，第三卷，页720中。

4.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页61、62、63。

经，译文水平较高，原因之一就是得到裴承远父子、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文士的协助，这是开名僧与文士往来风气之先导的人士。后来竺叔兰结交乐广、支孝龙结交庾數、阮瞻、谢鲲等，都表明僧人与文士往来风气之增长<sup>1</sup>。

东晋时名僧与文士往来风气大开，以晋初支遁与晋末慧远为最。赖永海《佛道诗禅》便以支遁为诗人与名僧交游之开先河者<sup>2</sup>。支遁善文学，有诗才，与名士王洽、殷浩、许询、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等人过从甚密，谢安、王羲之很推崇他。《世说新语》多次提到他。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下说：“支遁始有赞佛咏怀诸诗，慧远有念佛三昧之句。”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肯定支遁对佛理引入诗文之开创有功<sup>3</sup>。我们在现存的支遁作品中仍可以看到他《八关斋诗》《咏怀诗》等寓托佛理之作<sup>4</sup>。

诗人受佛理影响的创作方面，赖永海大胆推定以《兰亭诗》为代表的玄言诗是东晋佛教般若学与玄学汇通的产物<sup>5</sup>。孙昌武也支持玄言诗与佛学的关系，并以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用的《续晋阳秋》云“（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因果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来肯定许、孙二人以佛入诗的事实<sup>6</sup>。也许玄言诗与佛理的关系并非必然存在，然而此期诗人有佛诗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同时期的东晋诗人中，张

1. 孙昌武书，页64。

2. 赖永海：《佛道诗禅》（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页143。

3. 孙昌武书，页66。

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载支遁诗十八首，主要表现佛理，亦杂以玄言，描述山水。

5. 同注2。

6. 孙昌武书，页67~68。

翼有《赠沙门竺法顥三首》《答庾僧渊诗》等以禅人诗之作<sup>1</sup>，或可为东晋初年诗人禅理之作的证明。

东晋末年以慧远为中心的诗禅交流就更为兴盛了。慧远算是比较自觉地以文学宣扬佛教的倡导人，有《念佛三昧诗集》之编撰<sup>2</sup>，其《庐山东林杂诗》云“一悟超三益”，明显是一首宣扬佛理的作品<sup>3</sup>。同时期唱和的文士亦多诗禅之作，如刘程之《奉和慧远游庐山诗》、王乔之和张野同题唱和诗、王齐之《念佛三昧诗四首》等等。<sup>4</sup>

诗禅交融在东晋初年确已开展创作之风，在东晋末年唱酬渐盛，至南北朝崇佛与诗学两者兼盛，诗禅之间水乳交融，更加相得益彰。宋初谢灵运好佛，尤崇竺道生“顿悟成佛”之说，也巧妙入诗。《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审美，使用了“悟”字：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  
虑，一悟得所遣。<sup>5</sup>

皎然《诗式》曾云：“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皎然肯定谢灵运在诗禅融合上的成功，我们由谢诗《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也可以看出山水诗得空王之助的澄迥境界。

- 
1.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二，页892中、893中。
  2. 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广弘明集》第三十卷，页351中。
  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十，页1085中。
  4. 同上晋诗卷十四，页937中、页938中。
  5. 同上宋诗卷二，页1166中。

谢灵运之外，晋南北朝诗人如颜延之、沈约、梁武帝萧衍、徐陵、江总等人都有礼佛赞佛、以禅入诗的作品。方外诗僧如康僧渊、佛图澄、鸠摩罗什、释道安、竺僧度、竺法崇等等，现今也都有诗作留存。可见诗禅交涉早在唐人“以禅入诗”，宋人“以禅论诗”之前，已充分发展，其后因应唐诗成熟变革，才突显融合的意义。

## 二、诗禅交涉的基础

诗与禅之所以能互相融通，主要因其有相似的某些特质。有关这方面论者极多。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认为：“诗禅沟通之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将经验之世界转化而为心灵之世界。”<sup>1</sup>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认为：“诗和禅在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等各方面有着极微妙的联系，并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价值取向之非功利性”“思维方式之非分析性”“语言表达之非逻辑性”及“情感特征表现主观心性”<sup>2</sup>等。孙昌武《诗与禅》认为：“禅宗的发展，正越来越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的主观心性，越来越否定修持工夫而肯定现实生活。而心性的抒发、生活的表现正是诗的任务。这样诗与禅就相沟通了。”<sup>3</sup>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示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使它们有互相沟通的

1. 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页57～58。
2.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版），页297～319。
3. 孙昌武：《诗与禅》（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页44。

可能。”<sup>1</sup> 杜松柏氏认为诗禅所以能融合是因为：一，时代背景提供融合的机会。二，禅祖师以诗寓禅形成风气。三，禅宗基于民族习于简易的特性，故以诗寓禅。四，绕路说禅的需要，故以诗寓禅。<sup>2</sup>

以上诸说各有所重，综合起来已可看出诗禅沟通的各项特质。本文专从诗的本质与禅的本质来看其融通的基础。

诗的本质是以精神主体为主的，诗是情志的咏叹与抒发透过韵律化的语言而成。《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sup>3</sup> 吴战垒《中国诗学》说：“诗从本质上说是抒情的，抒情诗的产生是人意识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对立，独立反省的意识，一面通过意识的反光镜认识世界，一面又从反射到心灵的世界图像中省视内心的秘密。”吴氏并引黑格尔之说“（诗）是精神的无限领域”，它关心的是“精神方面的旨趣”<sup>4</sup>。由此可知诗是着重心灵主体与精神世界的一种文学。禅在本质上也属精神内在领域。“禅”一字可作多层意涵了解，就宗教发展与演变来看，禅可泛指佛家，也可特指禅宗，就修为内涵与方法来看，禅可指觉性（佛性）、禅那（静虑）或禅定（三摩地）。达摩《血脉论》云：

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

- 
1. 袁行霈：《诗与禅》，收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页103～111。
  2. 杜松柏：《唐诗中的禅趣》，《国文天地》七卷二期（1991年）。
  3. 郭绍虞：《历代文论选》上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年版），页36。
  4. 吴战垒：《中国诗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3年版），页9～10。